治学方法

费孝通的治学特色

□丁元竹

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

在中国学术界，费孝通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学术特色的学者。费孝通治学的鲜明特色是“学以致用”。早在从事社会学初期，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他说：“‘学术尊严’我是不从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的。”在后来的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学者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为从方法论上讲，“为研究而研究”是一种受兴趣驱动的活动，为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兴趣不同，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

20世纪80年代，他又以类似的语言批评了那种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否则它无异于游戏和玩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内在动力。

1983年，在江苏省组织小城镇问题研究时，他对课题组的同志说：“一定要坚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在他看来，学者就是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

从实求知

1979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费孝通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社会学恢复初期，费孝通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指胡乔木，笔者注）同志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头人，费孝通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36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研究，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论和思想，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实践证明，社会学只有贴近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才有前途。

20世纪末，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费孝通认为自己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出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费孝通找到了探索这条出路的方法，那就是实地调研。

博采众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孝通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孝通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孝通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是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利奇（Sir Edmund Leach）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2）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孝通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我们应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这个思想是费孝通从人类学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

学而思、思而学

1992年春，我随费孝通到山东曲阜，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孔庙坐了很久。我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和感想，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认识到，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这时，费孝通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

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孝通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而是紧紧追赶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而涉及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他说：“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1993年7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20世纪最后10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政治平等、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文化公平和环境公平等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升华，成为他的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你在读什么书

生态环境为何持续恶化

□俞可平

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及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整体上进入梦寐以求的“小康”阶段，国家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大国。然而，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果。我们的现代化成就，特别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我们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日益不堪重负。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沙漠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环境恶化，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按理来说，发展中国家应当认真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它们环境恶化的前车之鉴。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贤们，之所以摒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应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这些后继者们忘记了先贤们当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覆辙。其实，环境问题虽然跟宏观政治经济体制不无关系，但直接相关的却是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换言之，如果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不当，社会主义条件下照样会有穷山恶水。

冉冉博士的这本《中国地方环境政治》，就是一部专门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的著作。她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着重剖析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制度方面的执行偏差。换言之，冉冉博士试图回答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中央政府极其重视环境保护，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持续增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中共中央还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正式列为国家需要长期推进的四大文明之一，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道列为基本国策，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了最为严厉的“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生态环境依然在长时期中持续恶化？

近年来，众多的环境治理研究者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冉冉博士的这本著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她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政策执行偏差”，即决策模式、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公众参与和全球化进程。从相当程度上说，她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这可能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她引入了政策执行研究的方法，力图避免“集权—分权”方法的偏差，从而使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和过程化；二是她的研究有田野调查的基础。尽管本书更多的是宏观的政策分析，但就我所知，冉冉博士早些年曾经做过许多生态治理方面的实地调研，这使她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具有一种一般学者难得拥有的“现实感”。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一书所作的序言。

怎样破除成见

□李卫民

在读书学习中如何避免成见，晚清名士李慈铭和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给我们提供了范例。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名著《困学纪闻》，在后代影响很大，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何焯，先后为《困学纪闻》作出详细校注，阎注水准较高，何注也不可埋没，在阎、何二注的基础上，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全祖望又对全书进行全面整理。到道光五年，翁元圻又汇编此前的笺释本，形成更加完备的注本。1861年李慈铭初读翁注《困学纪闻》，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成果，他竟多生疑惑，他认为，《困学纪闻》“虽取便初学，实鲜可观”，“不解本朝阎百诗诸儒何以注之不已”。在11年之后，李慈铭重读《困学纪闻》，对王应麟仍予以攻击，指责王应麟“于名物训诂，领会未深，多囿于宋季义理肤浅之谈，而汉儒家法，动多窒碍”。及至1886年，李慈铭再度披览《困学纪闻》，竟有类似大彻大悟之语：“王氏此书赅综甚博，一生读之，尚未贯彻。余辛酉日记中病其细琐，尔时识力未能坚定如是。”

李慈铭对《困学纪闻》的态度前后不一，极耐人寻味。李慈铭对学术声誉与《困学纪闻》相仿佛的洪迈的《容斋随笔》，则非常重视，多次写下长篇读书笔记，而对《困学纪闻》则多是概要性评价。两相对照，可以想见，其中缘由是李慈铭对洪迈的治学路径更为熟悉，故能不断深入，而王应麟的思维模式、治学路径，与洪迈差异较大，李慈铭难以深入，故起始阶段对王应麟多有不敬之词。随着年事渐长，修养、识力不断提升，对原先有所误解的名著，也能有较为准确、深入的把握。李慈铭一贯自信，常常指责他人，但也能在不断反省、总结中升华自身认识，纠正先前的成见，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类似现象，在李慈铭的阅读史上，并不罕见（李慈铭对桐城派散文祖师方苞，也经历了从挖苦讽刺到基本肯定的曲折过程）。

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时代略早于李慈铭。在19世纪中叶，她是英国闻名遐迩的作家。夏洛蒂也是一位爱书人，细心阅读了很多名著。杨静远女士编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也可被视作一部书话集。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她对简·奥斯丁的评论。

在《简·爱》出版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乔·亨·刘易斯，发表评论文章，称赞这部小说，也向夏洛蒂建议，应该认真学习简·奥斯丁的作品，因为奥斯丁女士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最伟大的人性画师之一，以及空前未有的对达到目的的手段具有最微妙的感觉的作家之一”。夏洛蒂找来《傲慢与偏见》，但是，她对此书评价甚低，她指责奥斯丁在这部书中的描写脱离现实生活，单调、刻板，书中的淑女绅士“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缺乏生活气息，没有激情。夏洛蒂知道自己的意见与刘易斯针锋相对，但她“甘冒此风险”。夏洛蒂发此论，多是感到刘易斯对她进行了说教，产生一定的逆反心理，故而言辞也有过当之处。

但是，夏洛蒂很难坚持己见，因为“时常有人问我是否读过她的书，而我否定的回答使得对方大为惊讶”。她请求出版人给她寄送几本奥斯丁的作品。很快，她收到了《爱玛》等书。在仔细阅读之后，夏洛蒂也做了认真反思。首先，她认为，应该调整阅读态度。她指出，奥斯丁的小说自成一体，应该用“恰如其分的欣赏态度来读”“任何近似热情或热心的情绪，任何强有力的、泼辣的、发自内心的情绪，都是格格不入的”。其次，她在读了《爱玛》之后，虽然对奥斯丁仍有所保留，但是，她已经认识到了这位前辈女作家的过人之处：奥斯丁善于描写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描画如生，深入心灵深处，特别是对人际交往中的细腻感觉、灵活表达，更是奥斯丁独擅胜场之处。夏洛蒂认定，奥斯丁是一位“完美而明智的上等妇女”。很明显，夏洛蒂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对奥斯丁的看法，对奥斯丁做出了总体肯定的评价。

无论是李慈铭，还是夏洛蒂·勃朗特，都是好学深思之士，他们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见解、文笔，都有超乎同侪之处（很多人都认为，在晚清文坛，李慈铭文才最高，而夏洛蒂·勃朗特也被不少评论家认定为一位原创性很强的作家，狄更斯在创作时也模仿过她），这也是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两人的实践也说明，好学深思之士，往往也容易产生成见，特别是由于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都很强，有时，他们的成见也很深。这一点，确实应该着重指出。当然，成见也是可以克服的。李慈铭、夏洛蒂·勃朗特，都是在深入的研讨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成见。

综合二人的经验、教训，避免成见的诀窍，大致有二。其一，应该养成深入反思自我的习惯。李慈铭和夏洛蒂·勃朗特，都很有主见，但是，他们并未发展到自以为是的地步，恰恰相反，他们经常反思自我，故也能意识到自己的某些缺点，并且能够主动改正。其二，要重视他人的意见。这一点，与坚持独立思考并不矛盾。独立思考，是可贵的品质，但个人的视野、背景、能力总有其局限性，他人的意见，往往有补充之效。特别是应该重视生活环境与思维习惯与自己有较大差异的人士的意见，这些人士的意见，其补充作用，尤其明显。万物皆备于我，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认真思考他人的见解，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克服自己的某些成见。

读书方法

反躬自省

□庄媛萍

《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可谓一篇为政启示录。战国时齐相邹忌，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欲比于齐国徐公，问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妻说：“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问其妾，妾答亦如是。问客人，客人回：“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翌日，徐公来访，邹忌视之，自叹弗如。于是反躬自省，悟出道理，向齐王道来此事。邹忌表示：微臣根本比不上徐公，妻偏爱我，妾畏惧我，客人有求于我，因此都说我比徐公美。如今齐国后宫佳丽无不偏爱齐王，大臣无不畏惧齐王，国内外无不有求于齐王，由此看来，齐王受蒙蔽太严重了。齐王于是下令悬赏进谏，一时间进谏者门庭若市，数月后偶尔进谏，时间一长基本没有什么可谏的了。燕、赵、韩、魏等国听说此事，皆往齐国朝拜齐王。

谏之由来：反躬自省

这篇古文给予我们诸多思考。古人的智慧与勇气，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邹忌之所以能悟到“王之蔽甚矣”，是因为他时刻有一种反躬自省精神。这种精神，让他能够独立思考，即便别人说得再好听，他始终保持探索真相、清醒客观的宝贵意识。反躬自省是一种可贵精神，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为官之途，不畏浮云遮望眼，拨开云雾见月明。

许多落马官员都会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堕落过程——内心欲望的不断膨胀。能够反躬自省的领导干部，虽仍不足以言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但往往清醒不自骄，客观不武断。清醒客观不容易让人迷失，不迷失则欲望难膨胀，不膨胀则安全有道。

纳谏态度：从善如流

如果说反躬自省精神是向内求实，从善如流就是对外求真。古人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众意见可疏导不可封杀。齐王求谏、纳谏的勇气着实可嘉，要具备齐王的心胸与勇气，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广开言路，重视基层调研，征求各界意见，自觉接受监督，是各级政府一贯的做法。这些年各种听证会不断召开，但有多少是走过场，有多少是真重视？走过场容易，真重视很难。政府每年出台那么多文件，有多少能够真正解决民意之所需？从善如流不应是一种姿态，更应该是一种责任。

求谏容易纳谏难，纳谏容易分辨难。从善如流，如何分辨意见是否“善”？做重大决策前，有多少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认真倾听各界人士意见，再把各类意见如实整理、科学分析？有多少民众意见能够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后上升为决策依据的过程？

谏归何处：重在落实

这篇古文着墨更多的是纳谏过程及作用，对谏之落实并未多谈，但从燕赵韩魏等国皆来朝拜齐王来看，齐王纳谏的效果应是不错的。事实上，决策与落实才是关键和重点。确实如此，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还处于调研阶段，民众意见的汇总、整理、分析、采纳也很重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在于落实”。总而言之，落实很重要。

名篇赏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5年第6期要目

决策要闻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本刊策划
“互联网+”升级政府治理（共7篇） 高红冰等

理论视点
我国海外文化传播战略亟待调整 余 博

改革纵横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张震宇
放活土地经营权需要点“主义”和历史耐心 李伟伟

治党论苑
选拔和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的专业性取向 刘 昕

社会治理
存量改革亟须社会合作意识的助力 王道勇

观往知来
县域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今启示 陈 朋

思考交流
习近平的政治人格特点 李玉贵 李 婧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年第3期要目

本刊特稿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观念基础 张恒山

党内法规研究
法治体系内的党内法规探析 付子堂
论国家法律与党纪党规关系之协调
——以当代德国为例 周淑真 袁 野

网络社会研究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刘少杰
网络权力变迁中的国家机遇 陈 氚
数字利维坦：信息社会的新型危机 郧彦辉

党建
法治思维与执政党建设关系思考 齐卫平
党的规矩及其时代要求 刘红凛

哲学
发展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庞元正
论发展本质的创新实践规定 董振华